

特 使

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

W·艾夫里尔·哈里曼 合著
伊 利·艾 贝 尔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特 使

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

(1941—1946)

W·艾夫里尔·哈里曼 合著
伊 利·艾 贝 尔

南 京 大 学 历 史 系 译
英 美 对 外 关 系 研 究 室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ICIR 226553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W. Averell Harriman and Elie Abel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5

根据纽约兰德公司一九七五年版译出

特 使

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
(1941—1946)

W·艾夫里尔·哈里曼 合著
伊 利·艾 贝 尔

南京大学历史系 译
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5印张 547,000字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96 定价 2.00 元

(内部发行)

048

出版说明

威廉·艾夫里尔·哈里曼(1891—),是美国布朗兄弟—哈里曼财团的主要成员。四十多年来,此人亦官亦商,正是列宁所指出的“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式的人物。哈里曼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跻身官场之后,在罗斯福执政时期,历任商务部商务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派驻英国的特别代表,驻苏大使;在杜鲁门执政时期,历任驻英大使,商务部长和马歇尔计划欧洲署署长,1951年担任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专门研究西方的防务计划。1955—1958年,任纽约州州长。此后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又担任过巡回大使,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参加过1963年的核禁试条约谈判和1968—1969年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1975年和1976年还先后奉福特和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之命访苏,与勃列日涅夫会晤。

《特使》这本书记述哈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使英苏两国那段经历,是伊利·艾贝尔根据哈里曼的笔记、备忘录、函电稿和其他文件以及口头回忆写成的。伊利·艾贝尔是哥伦比亚大学卡伯特讲座教授和新闻研究院院长,曾任记者和广播员多年,以前写有《导弹危机》(1966年出版)和与人合写的《美国卷入亚洲的根源,1784—1871年》(1971年出版)。

《特使》一书,据哈里曼自己说已孕育了三十年,它出版于1975年,决不是偶然的。如所周知,近年来,面对苏修在“缓和”幌子下大肆扩张、与美争夺世界霸权的形势,美国统治集团就外交政策问题特别是对苏政策问题,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各派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潮代表,纷纷抒发己见。哈里曼在1970年曾说过,“我从

来不作一个袖手旁观的后座乘客，至今仍然有参加当前战斗的雄心壮志。”他参与辩论的具体行动之一，就是下决心与伊利·艾贝尔合作写出这本《特使》。全书虽然写的是“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实际上记述的重点是美苏关系。很明显，哈里曼企图通过当年外交折冲的经验，现身说法，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对苏政策观，针对时弊，开出药方，以期当道者采纳。至于当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与今天勃列日涅夫盘踞下的苏修有着本质的不同，当年的国际环境与今天的世界风云有着千差万别，哈里曼是不管的。

哈里曼在本书前言中明确指出，“我衷心赞成缓和政策。……在这核时代里，战争是不堪想象的。我们的利益要我们尽量排除紧张关系，为我所说的‘竞争的共处’而努力。”所谓“竞争的共处”就是“既不能指望迁就苏联，也不能采取将其扑灭、肃清的做法，而只能依靠头脑冷静、时刻警惕和合情合理的态度来保卫民主利益，以及用坚定不移的决心去寻求那对双方有利的协议”（阿瑟·施莱辛格为哈里曼所著《变动世界中的美苏关系》一书所写的序言）；同时主张用“美国的理想”也就是美国生活方式向苏修进行渗透，以“经济和技术”的“纽带网”促使苏修就范，从而达到他用作本书末章标题的局面：“权力的中心在华盛顿”。鉴于哈里曼是民主党内的元老，又是美国政界公认的苏联问题专家和谈判能手，他的这种贴上“竞争的共处”标签、大有绥靖政策气味的主张，是会对卡特政府的对苏政策有所影响的。

如前所述，本书是哈里曼亲身经历的写照，因而尽管所述及的历史事件都已有专门著述和当事人回忆录可供检索，但书中仍不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可供参考。至于本书的观点则是十分反动的，例如诬蔑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美化帝国主义的“自由”、“民主”，诽谤我党，吹捧蒋帮等等，请读者注意批判。

本书是由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负责译校的，在译校过程中，曾得到该校外文系同志的帮助，其中第十四章至十六章，也是外文系翻译的。

前 言

v

本书的孕育，历时三十年。长久以来，我感到有义务将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验、见闻和判断记录下来。我同温斯顿·邱吉尔有亲密的私谊，又同约瑟夫·斯大林有密切的交往，这都是任何美国人比不上的。当然，我从童年时代就认识富兰克林·罗斯福了。

但是其他的活动一直在作梗。1953年，我开始同赫伯特·菲斯一起整理我1941—1946年间的书信文件。当时我写了大量的备忘录，以增补早先仓促写成的笔记。然而，当我在1954年决定竞选纽约州州长时，这一合作不得不告终止。菲斯则独自完成了他的佳作《邱吉尔 罗斯福 斯大林：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和他们所谋求的和平》。我认为菲斯的书是一大贡献，但是由于上述情况，该书也就不能包括我个人的印象和观点。

在随后的若干年中，不论在朝在野，我都为眼前事变所羁绊，以致写这类包罗万象的著作所需要的专心致志，我是一点也不能想望的。

直到大约三年前，伊利·艾贝尔建议由我们共同写作此书，我才终于下决心动手。我久已钦佩他的明白晓畅的文笔，亦即他那用以汇集资料和阐明晚近历史的技巧。经过相当多的研讨后，我们决定采用亨利·史汀生和麦乔治·邦迪合著的《在平时和战时为国效劳》一书中所创造的写作方式。我们的书将用第三人称^{vi}撰写，当然，从我的笔记、备忘录、书信、电文和回忆录中摘引的除外。

虽然我未写日记，但是除了给罗斯福、霍普金斯等人的电报和个人信件之外，我有可能总是竭力把重要谈话写成笔记和备忘录。当时我对工作是如此专心，如此完全倾注于支援战争的行动，以致许多笔记必然是简短的。在伦敦，每每与邱吉尔共度深夜，而我在第二天又要早起工作，简直挤不出那怕是片刻工夫来写详细的记录。然而，在莫斯科，由于需要翻译，我也就有时间详细记录我同斯大林和其他苏联官员的谈话。

过去的两年，伊利·艾贝尔同我紧密地一起工作。用史汀生评述邦迪作用的话打个比方，本书的风格和结构完全出于伊利之手。他巧妙地把我自己对事件的叙述穿插在战争的较为广阔的来龙去脉之中。在内容上，我们经常进行磋商；种种分析和判断则遵从我的意见。他精确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思想和感受，以及我对往事的论断。

我必须感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约翰·F·肯尼迪政治学院副研究员查尔斯·梅尔很有见地的帮助。他现在是纽约莱尔曼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以不倦的研究和明睿的意见，在编选用于本书的原始资料方面对我们帮助很大；并且在和我们的多次讨论中，帮助我们突出中心和避免易犯的错误。

回顾五十年来我同苏联折冲的经验，我发现我的基本判断依然没什么改变，虽然情况已发生剧烈的变化。我因那些判断曾遭到政治光谱两极的攻击。一些人骂我是战争贩子；另一些人抨击我对共产主义太温和。我依然象在1945年一样，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同克里姆林宫之间没有妥协的希望，但是为了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消除战争而共同生活下去，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中排除冲突。

我一直认为，俄国人民施加的内部压力 and 世界舆论的影响早

晚会导致苏维埃制度的某些松动，而对人权的较为尊重也会逐渐有所进展。这一过程无疑已经发生，虽然不很均衡而且十分缓慢。

我衷心赞成缓和政策。但是，在我看来，使用一个美国人所^{vii}不了解的法文字是危险的。Détentè（缓和）这个法文字的含义是各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松弛。我看不出有什么人会反对这个目标。然而我的看法是，缓和政策的真正成就，向人民吹嘘得太过分了。一位来访的俄国编辑最近告诉我，他在美国接触到的人们认为缓和意味着苏联在世界各个角落承认现状；如果苏联在任何地方的行动被认为与现状冲突时，必然意味着俄国人破坏了谅解。我们同苏联的谅解事实上是特定的，因此是极其有限的。这种谅解的达成是希望防止核战争，并使进一步的协议成为可能，然而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1974年6月同勃列日涅夫先生谈话时，我发觉他赞同我对缓和概念的理解。他表示我们应当一步接一步，一年复一年地努力前进。他希望一年一度的互相访问——这一年总统去俄国，另一年他回访美国——将改善气氛和这种进展的前景。在苏联国内，勃列日涅夫本人毫不含糊地致力于缓和。我们方面如不努力在半路迎接他，那将是轻率的。然而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广大公众不要把缓和的概念同其他诸如 rapprochement（和解）或 entente（协商）之类的法文字混同起来，这两个字都有政府之间建立普遍融洽的和较为圆满的谅解的含义。用日常易懂的英语说明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和阐明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也许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

我们在减缓紧张方面，特别是在核领域和欧洲的柏林问题上，已经有所进展。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些人认为紧张关系的任何缓和都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俄国人而不利于我们，对于这些人，我是极力反对的。在我看来，我们无可选择。在这核时

代里，战争是不堪想象的。我们的利益要我们尽量排除紧张关系，为我所说的“竞争的共处”而努力。拿我来说，我是不怕竞争的。我们国家赖以建立的那种理想所具有的力量，使我们有机会在世界上扩大我们的积极影响。我们的军事力量，尽管是不可缺少的，但基本上应是防御性的。我在旅行中发现，我们的理想对任何地方的人都有强烈的感染力。人们要求我们把这些理想付诸实行。按照我的经验，美国的历届总统，谁最雄辩地向世界人民讲话，谁就有着最大的影响。我还记得罗斯福逝世时俄国妇女在莫斯科街头哭泣的情景。她们认为失去了一位朋友，一位她们希望领导世界走向和平的朋友。约翰·F·肯尼迪被杀害时，南美洲和非洲的农民在他们的茅舍里挂起了他的照片。他们把他看作一位关心他们前途的人。这听起来好象有些伤感。但我确信，这就是实际的世界政治。

我们应当承认，美国的政策同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通居民的想法，并非经常合拍。现在越南的悲剧已经过去，重新估价我们目标的时候已经到来，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通力合作，以便使我们能够再次给世界以鼓舞、希望和领导。

最近我去莫斯科的使命是率领福特总统派遣的由美国名流组成的代表团，代表美国参加1975年5月8日至9日在苏联举行的战胜法西斯德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

勃列日涅夫在他的主旨演说中，强调和平是这次庆祝的主题。他赞扬在这一带来了三十年和平的胜利中红军的英雄主义和苏联人民崇高的献身精神。他指出我们之间，尽管“社会制度不同”，还是实现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并呼吁和平共处与缓和，以防止另一次世界性灾难。他也谈到“对解放运动的高度原则性的……支持……赋予我们的和平政策以更加巨大的力量……”。

两天庆祝在许多方面提供了明显的证据：克里姆林宫决心避

免另一场战争惨剧，然而不论什么地方一有机会还是要支持“解放运动”。

对战争期间我的那些同事表示谢意时，我首先要提到我的女儿凯思林。她同我一起在伦敦和莫斯科度过了国外的五年。由于健康的原因，我的妻子不能进行这些艰苦的旅行。凯思林先后在国际新闻社伦敦办事处和《新闻周刊》找到了工作。当然我个人渴望凯思林在我身边。我知道这对她将是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再说，当时英国人担心德国的轰炸和入侵的威胁，还在把孩子送往加拿大和美国。我认为凯思林的到达会被视为美国具有信心的一个标志。我记得就连邱吉尔夫人听我说凯思林要来英国时也大为惊讶。

凯思林写了大量的书信回国，这些书信我们已广泛地引用了。她把自己对周围的人和事的机敏了解同生动的表达风格结合了起来。在莫斯科，起初她为战时情报处当助手，后来负责领导它的活动。此外，她管理斯帕索大厦，在那艰难的日子里，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斯大林有一次评论说，她留在战时的莫斯科对提高公众士气有巨大的助益。

我幸运地有罗伯特·P·米克尔约翰担任我的助手，他曾在战前的商业活动中同我共事。米克尔约翰为我处理一切事务。他不仅笔录我口授的特别机密的东西，而且独力管理伦敦使团。他保存了大量的笔记和写下了一份关于哈里曼使团两年半经历的报告，这些都为本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我们赴莫斯科之前，米克尔约翰被任命为海军上尉军官。

我要永远感谢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当他负责租借计划时，给我派来了两位能干的年轻法律家，温思罗普·布朗和查尔斯·诺伊斯，他们办事的效率是异乎寻常的。

我的工作人员中，最为出众的也许是萨姆·伯杰。我要求有个同美国劳工运动接近的人在英国处理人力问题。在我的请求下，当时在白宫工作的伊萨多·卢宾从西德尼·希尔曼那里得知有萨姆这么个人。由于时间紧迫，我不得不于1942年1月返回华盛顿期间从白宫去五角大楼的路上在一辆出租汽车中会见萨姆。我当即在汽车里聘定了他，我对西德尼·希尔曼所出具的品格介绍书完全信赖。事实证明，萨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为了补救煤炭生产的落后状况，我们使英国人着手开掘当时英国还不知道的露天煤矿。我派伯杰去美国为当时供应短缺的大型铁铲进行交涉。他带了英国军需部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官员哈罗德·威尔逊*同行。萨姆在外交界一帆风顺，在好几个关键性的岗位上卓越地起了大使的作用，留下令人惊叹的工作成绩之后，于最近退休了。

战时我在英国服务的岁月里，过往的还有许多别的人。我特别感谢派到使团来的陆海空三军军官。尽管他们通向英国政府各部的门户都是我为之打开的，但他们所做的工作证明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是非常有效的。

在伦敦，我白手起家地搭起了工作班子。但我只带了凯思林、鲍勃·米克尔约翰和约翰·R·迪恩将军到莫斯科去。迪恩将军是去领导我们新建立的驻苏军事顾问团。我不久感到需要一位俄国问题专家作为公使衔参赞，并决心争取乔治·凯南。为了重新把他派到莫斯科去，**在哈里·霍普金斯的帮助下，同国务院x 交涉了九个月。我的决定得到了丰硕的酬报。凯南关于俄国的知识——语言、文学、历史、政治——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我担任大使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乔治·凯南同迪恩将军

* 哈罗德·威尔逊后来曾任英国首相（1964—1970）。——译者

** 1935年凯南曾在美国驻苏大使馆工作。——译者

充当了我的主要顾问。我们得到了一个优秀的外交官班子的支持，对于他们，特别是对于汤米·汤普森和埃迪·佩奇，我是感激不尽的。我非常尊重约翰·佩顿·戴维斯和约翰·梅尔比的工作，这两位干练的、忠心耿耿的外交官在麦卡锡清洗中蒙受不白之冤而成了牺牲品。

我一定要提一提“奇普”*波伦的妻舅，我的亲密朋友查利·塞耶，他在我1941年9月战时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给予我巨大的帮助。不幸他成了麦卡锡恐怖的另一牺牲者，使我国失去了一位最能干和最富有想象力的官员。

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为我们服务得很好，例如弗朗西斯·史蒂文斯、鲍勃·塔克和汤姆·惠特尼。此外，波兰问题专家埃尔布里奇·德布罗也偶尔光临，这是很令人鼓舞的。

我还要表示我对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的感谢。我们几乎每天接触，交换高度机密的情报。我必须承认，在这种交往中，我得了较大的便宜，因为英国外交部为阿奇提供的有关世界范围动态的情报比国务院为我提供的充分得多。我们两个大使馆的人员也配合得象一个班子一样共同工作。

我经常见到斯大林。这一情况引起外交使团其他成员要我和他们共同解决他们的难题。我记得当时的外交使团团长阿富汗大使苏丹·艾哈迈德的多次来访就是一例。那时，他的国家和苏联正发生争执，彼此都对两国边界河流奥克苏斯河中的某些岛屿提出所有权要求。阿富汗农民象他们的祖辈那样继续在岛上割草，而红军总是一次又一次从河流的那一边射击他们，有时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大使的要求下，我尽力劝说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制止这一行动。争执最后解决了。不知我是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

* “奇普”是查尔斯·波伦的绰号。——译者

是战后年代我每次访问阿富汗时都被作为一个朋友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我同这些外交官的交谈有助于我认识俄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只有日本大使馆是不相往来的。

W·艾夫里尔·哈里曼

目 次

前 言	1
第 一 章 全力援英，但不参战	1
第 二 章 “成器扬名”的道路	32
第 三 章 “英国人能坚持到底，但不能单独打赢”	62
第 四 章 克里姆林宫的红色狼群	89
第 五 章 珍珠港：“现在至少有个前途了”	120
第 六 章 没完没了的失败	141
第 七 章 重访莫斯科，邱吉尔同行	168
第 八 章 “比起提尔锡特的木筏来，我看还是安乐 的沙漠绿洲为好”	190
第 九 章 海上插曲	218
第 十 章 告别英伦	242
第 十 一 章 “我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	262
第 十 二 章 德黑兰——“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 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	286
第 十 三 章 “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	318
第 十 四 章 波兰——试金石	353
第 十 五 章 孤军死战的华沙起义	376
第 十 六 章 莫洛托夫对战后贷款的“异乎寻常的要求”	409
第 十 七 章 雅尔塔——“如果身体尚好，罗斯福或许 会坚持得久些，但我不能相信这会产生 任何重大差别”	433

第 十 八 章	从雅尔塔到温泉	466
第 十 九 章	杜鲁门承当重任	496
第 二 十 章	日本投降	529
第二十一章	别了，莫斯科	562
第二十二章	“权力的中心在华盛顿”	597
资料来源注释		616
索 引		629

第一章

3

全力援英，但不参战

1941年2月18日，罗斯福总统给威廉·艾夫里尔·哈里曼概述的任务是一项特殊使命。总统说，“我要你到伦敦去，并就除了参战以外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提出建议，以使英伦三岛不致沉沦。”哈里曼将是总统的私人代表。他向白宫而不是向国务院报告。他可参与影响战争进程的有关租借、海运、战略等的全部事务，并直接同邱吉尔首相及其属下的后勤和供应部门的大臣进行交涉。新任命的美国驻英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则处理美国驻外代表的正常事务，同英国外交部打交道，并向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报告。

哈里曼在格罗顿*上学时就认识埃莉诺·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同埃莉诺的弟弟霍尔·罗斯福是同班同学。哈里曼同姊姊玛丽·哈里曼·拉姆齐一道，与家庭里牢固的共和党传统决裂，于1928年投票选举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又于1932年、1936年和1940年投票选举罗斯福。他虽然并不完全相信新政的每一方面，却是华尔街头面人物中不责备罗斯福的经济异端并愿在全国复兴总署服务的少数人士之一。他还是罗斯福1933年建立的包括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沃尔特·蒂格尔和通用电器公司杰勒德·斯沃普等主要工业家在内的商务部商业顾问委员

* 格罗顿学校在波士顿。——译者

** 埃莉诺·罗斯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译者

*** 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是19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者

会的最早成员。后来，哈里曼出任该委员会主席达三年之久。他这时是四十九岁，是私人金融商号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和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经理部的总经理。

大约六个星期之前，哈里曼的朋友哈里·霍普金斯已提醒他，可能要他赴英担当一项重要的战时工作。接着，霍普金斯应罗斯福的请求，于1月间飞英，同邱吉尔首次会晤。现在霍普金斯既已回国，哈里曼便谒见总统，想确切地知道，总统所考虑委派给他的是什么工作。

总统和我谈起来，似乎我们彼此都已知道，我要出国的事在前些时候就已决定了〔几天后哈里曼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由于租借机构还未建立，在这边我同谁打交道，他说得有些含糊。然而，他解释道，不会是生产管理局；总之，完全不受国务院的制约。他说，举凡我认为重要的事情都要同他联系……总括说来，他漫无边际地谈了许多问题，同他担任总统以来我和他的任何一次交谈相比，这次要谦虚得多，不太自以为是和较有人情味。¹

他们的漫无边际的谈话曾涉及生产管理局（由通用汽车公司的威廉·S·努森和美国服装工人混合联合会的西德尼·希尔曼联合领导）的混乱状况，它是罗斯福为加快工业动员而建立的一个机构，但内部争吵不休。罗斯福意识到曾给努森掌管原料部门的哈里曼对他所创设的这个官僚主义机构并不太欣赏，于是为了安抚客人，他承认说：“你明白，艾夫里尔，我是天生的妥协分子。”

哈里曼立即接受了伦敦使命。他催促罗斯福毫不迟延地宣布此项任命，以便他能为眼前的这项艰巨任务进行准备，并配搭班子。总统于当天下午对聚集在他办公桌周围的白宫采访记者作出宣布：

总统：我认为你们尚未猎取到的新闻已经很少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出去时你们是看到的，那是有一桩事情已经讨论了一